

建交流平台。依托此平台,可以聘请国外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和优秀学者来华从事专题研究、实地考察、交流讲学等活动。按照西方汉学界的“惯例”,汉学家或中国学专家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到中国旅行、考察、交流,否则,其学术研究的资格或水平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同行质疑。过去,欧美等国的汉学家、中国学专家多以个人来华旅游或应中国高校、科研单位等邀请来华讲学、交流或参加学术会议,由于接待单位的不同导致来访者所接受的各方面信息也有很大差别,因而他们回国后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论著的学术水平和对华态度也有很大差异。“国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交流中心”设立后,努力争取使来此研究交流的专家、学者在华期间获得与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权威机构和专家学者交流的机会,获得与其研究领域相关的正确学术资讯,以便他们结束访问交流后把这些新的、正确的资讯传递给同行,增加中外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总之,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要扩大其影响,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努力走向世界,只有这样才能讲好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升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建设

张秋升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和基本依托。对于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问题,近年史学界已进行了广泛讨论,取得了多方面成果。<sup>①</sup> 这些成果对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建设目标、实现路径甚至具体操作多有论列,其中特别关注“话语体系”。<sup>②</sup> 人们不但高度关注“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批判反思“西方中心论”,而且对民族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等“话语体系”的构建深入讨论,以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话语体系。近期,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与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相汇合,将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向纵深推进,或从史学史的角度,结合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来讨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sup>③</sup>或以自己的亲身学术实践探究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sup>④</sup> 但是,对史料学这一历史学的基础学科,尚未有对其“三大体系”建设以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进行系统思考和探讨者。本文尝试对此进行初步思考,以期对建构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有所助益。

### 一、史料学的发展与现状

史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痕迹,我们只有依据史料才能认识、解释、建构、编纂历史。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的一门学科,它是历史学的

① 参见徐志民、李政君主编:《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

② 参见郭长刚等:《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③ 张越:《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④ 余新忠:《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践路径刍议——以生命史学为中心》,《南开学报》2023年第5期。

一个分支,在整个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故而我们认为它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基础学科。

史料与历史学相伴而生,史料学最初就包含在历史学之中,并随着历史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致,逐渐独立为历史学中的一项专门学术。进入20世纪,在中西古今史学交汇之际,史料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起来。凡是以“史”为名的学术或涉“史”学科,都必须以史料为基础才能开展研究,史料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较之史料搜集、整理、鉴别、运用等史料学的长期和广泛的实践,包括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在内的史料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则显得滞后和不足。20世纪上半期,史料学问题往往包含在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一类的书中,学科意识不强,至今仍有不少此类著作中列有史料学的专章。<sup>①</sup>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自觉地进行史料学体系的建设,其中有的是学术呼吁,有的则是具体探讨和设计。<sup>②</sup>但是,迄今仍然没有一部全面反映史料学知识体系的通论性著作,这说明史料学的知识体系建构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提出并付诸实践,将推动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踏上一个新台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20世纪以来,因七科之学代替了四部之学,各学科的历史分属各学科编纂,如文学史、哲学史都有史料学的问题,这些涉“史”学科也各有自己的史料学著作。本文所言史料学不止局限在历史学学科内部,而是包括所有涉“史”学科的史料学,其中重点考察文史哲三大涉“史”学科的史料学。

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编刊、运用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对史料学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史料学的理论方法的探讨相对薄弱,在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也有较大空间。这是当前史料学的总体状况。就取得的成就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各通史、断代史、专史等学术领域,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文献。形式上有史料汇编、史料选编、史料丛刊、史料专刊等。比如,20世纪上半期的四大新发现的史料,甲骨史料、敦煌史料、内阁大库档案史料、西北汉简史料等,均进行了研究和编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古代各类典籍的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丛刊、专刊等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相关史料汇编等,都是史料学成就中的荦荦大者。这些属于史料学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二,出版了各史的以“史料学”或类似命名的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类著作大约一百部,如通贯性的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文学史史料学》《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等,断代的有《唐史史料学》《清史史料学》《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等,专门的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青海史史料学》《汉文南亚史料学》等,史料学理论类的有《史料与史学》《史料和历史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史料学史类的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等。此外,还有翻译的国外的史料学著作,如苏联柳勃林斯卡娅的《中世纪史料学》等。其三,出版了

①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吴贯因的《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杨鸿烈的《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吴泽的《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等著作中,均列有专编或专章论述史料问题;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译著,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余伟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陈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弗领的《历史方法概论》(薛澄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等,也用大量篇幅论述史料问题。

② 参见刘萍:《建国以来史料学的理论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一些以史料学理论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并对史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广泛探讨。相关的著作有:翦伯赞的《史料与史学》、胡厚宣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齐世荣的《史料五讲》、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等。<sup>①</sup> 这些著作也多以史料的利用为学术宗旨,如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严格来说,类似于历史文献学概论之类的著作。对于史学即史料学、二重证据法、史源学等,都有较多的探讨。<sup>②</sup> 其四,成立了一些史料学学会。例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sup>③</sup>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sup>④</sup>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等。<sup>⑤</sup> 这些史料学学会,搭建了史料学学术平台,促进了学术交流。其五,兴办了一些学术刊物。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sup>⑥</sup>全国政协和各级地方政协编印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等。这些辑刊资料挖掘并保存了历史信息,服务于历史研究者的需要。

## 二、当前史料学存在的不足、问题及其成因

史料学发展到今天,由于自身及外在的各种原因,存在以下不足及问题。

其一,缺乏一部成体系的史料学理论专著或《史料学通论》。上面提到的翦伯赞、胡厚宣、荣孟源、齐世荣等人的著作,严格来讲,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史料学知识体系。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史料学理论方法方面的最新成果。作者自言,这是一部方法论的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史料问题和史料研究方法问题,所以可视为一部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著作,多半参照或仿效历史史料学、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sup>⑦</sup> 该书的导论部分,比较集中地表述了作者对史料学的看法;第一、第二章的“史料批判”“史料分类批判”,以及第八章“考证方法批判”,多有理论和方法的新见;其他各章讨论的是辑佚、版本、校勘、目录、注释、汇编等问题,这似乎还是一个历史文献学的架构。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一编“史料学引论”,讲的是史料学理论问题”,<sup>⑧</sup>共分为五章,史料、史料学、史料学和历史科学、史料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史料学研究的

①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齐世荣:《史料五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② 参见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桑兵:《傅斯年“史料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李锐:《“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史丽君:《陈垣的史源学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③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置的专门委员会之一,1959年定为此名。该委员会负责组织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撰写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推动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编辑以及对外交流。

④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于1992年,是由教育部主管的从事近现代史资料征集和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⑤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于1989年成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从事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它由三个分支机构组成,分别是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近现代文学史料学分会、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

⑥ 《近代史资料》,1954年创刊,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荣孟源任主编。自1954年至1985年荣孟源去世,《近代史资料》共出版60期,专刊21种,所有资料合计约2000万字。

⑦ 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导论”,第14页。

⑧ 安作璋主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



多方面意义及方法,可算作较为全面的史料学体系的著述,但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仍然遗漏不少。

其二,对史料学一些具体理论的探讨也不充分。诸如史料与历史本体的关系,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史料与观念、思想、理论的关系,史料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没有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史料与史学观念、思想、理论的关系为例,虽然20世纪50年代曾经讨论过史论关系,但只是得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认识,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具体的内涵尚需深入研究。从史料学实践的历史来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史料被发现后,从中生出新的认知和观念,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史料的发现刺激了新课题、新观念和新见解的产生。比如,甲骨学、敦煌学的产生,二重证据法的提出,等等。二是新的观念、思想及理论开出了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进而需要相关史料,于是学者们有意去寻求相关史料。比如,农民战争史研究激发了史家对下层民众史料的开发;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促使中国史家寻求中国史学中的史学理论,章学诚等被挖掘出来,以与西方史学理论相比肩,等等。再如,主体和史料的关系问题,当年荣孟源提出史料具有阶级性的论断,注重了史料产生的主体问题,实际上,用“史料具有主体性”表达更符合实际情况。在处理史料的过程中,时时都有主体的伴随,史料的留存、史料的流传、史料的整理鉴别、史料的运用实践等各个环节,史料都会打上主体的烙印。在史料解读和史料采择两个方面,主体性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王国维、郭沫若对待甲骨文,郭沫若与翦伯赞对曹操的认识和评价,郭沫若与范文澜对《诗经》“雨我公田”之解释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其三,迄今没有一部中国史料学通史。史料学发展的历史已历百年,作为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但至今没有一部史料学通史,各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也没有史料学的相关内容。曹树明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和刘萍、李学通的《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算是史料学史的著述,<sup>①</sup>但前者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而论,后者局限于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史料学发展,况且这两部书,前者以史料学家及其著作为个案编排,后者以史料学文献成果介绍为主。此外,金宏宇书中的附录“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派”,是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的论述;刘萍的《“史料革命”: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以“史料革命”为切入点,对近十年的史料学进展进行了梳理和评析。<sup>②</sup>这些著述虽然属于对史料学史的探讨,但均是局部的梳理和评论。上述学者都没有打破文史哲学学科界限,写出一部纵通与横通结合的史料学史。要解决现实问题,就要回顾历史。史料学史上,有着大量的供我们今天建设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实践经验、认识资源和思想素材,这些都需要研究史料学史。

其四,存在史料观念及运用上的偏颇。比如,过于追求新史料,而对旧史料用功不够;过于重视史料范围的扩展,而轻视对已有史料的解读;过于重视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重视不够;片面认为原始史料价值高于次生史料等。<sup>③</sup>又比如,人们普遍注重原始史料或第一手史料的价值,但这要辩证地看待。从主导方面看,越是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时间上越是接近事件发生的实际场景,史

① 曹树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刘萍、李学通:《当代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 刘萍:《“史料革命”: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北方论丛》2021年第5期。

③ 参见张秋升:《树立和坚持正确史料观念》,《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料价值自然较高,因为没有经过史料流传过程中一次次主体的“污染”。但是,事件当事人或原始史料的留存者,因与事件关系密切,所谓恩怨未绝,故而这类主体同样影响史料的真实性。固然,史料流传愈久,失真的可能性越大,但这种失真,是相对于史料的第一留存来说的,并不是就历史真相而言,后世史家对史料的反复考辨,却能够促使历史真相日益清晰。况且,当时所存多种记载可能还未问世,一时不能对勘考辨,后世资料丰富,具备了比较鉴别的条件,进而更能考得历史真实。

其五,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贡献研究远远不够。当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的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则重视不足,更多的还是局限于他们的理论贡献。迄今未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史料学的专著出版和科研项目立项,只有一些单篇的文章问世,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研究是不相称的。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傅斯年等人的史料学,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学贡献更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但经年累月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有着丰富的史料处理经验,而且在史料学理论上亦有重要建树,如荣孟源的《史料和历史科学》这部书,虽然体系性不强,但充满了真知灼见。该书分为15个专题,即由15篇文章组成,前四个问题是“史料和历史科学”“史料分类”“阶级分析”“辨别真伪”,属史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荣孟源既有长期搜集、整理、鉴别和汇编史料的实践,又能够从实践中抽象出自己的认识和理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出史料具有阶级性的论断,完善史料分类体系,丰富和发展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料学。<sup>①</sup>

此外,当前史料学还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不足与问题,如没有关注中国的世界史史料学的建设问题。虽然各大学历史系都设有史料学类似的课程,但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史料学著作迄今付阙;人们主要关注的仍然是文字史料,对其他类型的史料如口述史料、音像史料、实物史料等重视不够;大学史料学课程的设置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课程的关系,与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等课程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很好的思考和解决;文史哲史料学界学术交流不够,虽有上述史料学学会,但相互之间交流很少,甚至没有互动。

上述史料学发展的诸多不足与问题,大概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其一,史料学学科意识不明晰,加上史料学所涉学科和领域较多,因此,直至今日有些史料学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比如,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还是分支学科的问题,史料学与文献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等等。故而,史料学学术体系受到学科体系建设不足的影响。其二,因为史料学的应用性特别突出,所以不少人认为,这一学科既然重在应用,就不大需要进行理论的提升、方法的探讨和知识体系的建设。甚至有人将史料或史料学与理论相对立,而不是有机结合起来。其三,学者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编刊上,常常无暇顾及史料学理论的思考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因为每个“史”的分支学科,新史料源源不断地出现,都有大量的史料整理工作要做,需要耗费学者们大部分的精力,所以他们对史料学自身的发展完善反而思考较少。

<sup>①</sup> 曹志敏、张秋升:《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南开学报》2023年第5期。

### 三、当前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必要性与目标

历史以求真为其学科本质,不真的历史往往没有价值。真实历史的取得,首先必须严格审核史料,并科学解读史料。当前史料学面临着社会和学术的多方面需要,也面临着数字技术的冲击和挑战,尽快建构和完善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其一,发展唯物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史料学有其基础性贡献。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之一是实事求是,以求真为宗旨的史料学尤其能印证和发展唯物史观;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实层面上一是虚构伪造历史,二是歪曲历史断章取义,这些均需从史料学的角度加以厘清,需要对相关史料进行搜集、鉴别和考证。其二,纠正传延已久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误解。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只重理论、不重史料,殊不知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以理论取胜,但此后从未忽视过史料,只是理论与史料同样重视,并在理论上更胜一筹而已。就史料学理论层面而言,有翦伯赞、荣孟源、王可风、齐世荣等史家的著述;就史料学的实践层面来说,近代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古代典籍的校订和刊行等成就斐然;就史料学的教学而论,各大学历史系课程体系中都设有史料学课程。这些都是重视史料学的充分体现。其三,对涉“史”类学科而言,需要进一步夯实其史料的基础,因为史料对于它们不可或缺,离开了史料,其研究就无法开展。中国古典文学史史料学专家刘跃进曾说:“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sup>①</sup>“史学即史料学”的论断固然是错误的,但离开了史料则无史学可言,也是学者的共识。其四,当前各级各类课题多有史料“整理与研究”类的项目,也需要史料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从近年获批的各类项目来看,一个重要现象是从国家重大、重点、一般到地方省市及部门的科研项目,以“史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立项获批者,占了很大的份量,但作为史料学一部分的“史料整理”,不论其历史,还是理论,均疏于总结,这类整理研究性项目急需史料学理论及方法的指导,其最终成果的成败及评判,也需要史料学的衡准。其五,数字技术冲击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等电子版史料迅速涌现,史料的存储技术、检索技术、传播技术大大进步,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触及人们对史料的解读。新技术可谓对史料整理、鉴别、运用和解释,构成了几乎全方位的挑战。史料学应因时而动,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满足史学发展的新需求。

建构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学知识体系,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搞清楚史料学历史及现状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思想为指导,积极汲取其他学科的建设经验,面向史学发展的需要而进行。其中重要的工作,一是系统梳理史料学的历史;二是总结史家处理史料的经验教训,将之提炼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史料学理论。我们的出发点应是前人对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成就。在此,我们略作回顾。

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逐渐建构和丰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自觉而明确地探讨史料学知识体系者,以王可风、陈高华、白寿彝、张宪文、张注洪、李永璞等学者最具代表性。

王可风是1951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多年致力于民国时期

<sup>①</sup> 刘跃进:《史料的价值永不过时》,《光明日报》2014年5月26日。



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丰富的史料整理经验的基础上,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史科学应成为一门科学,其根据“是它在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科学的规律性”,“它是社会发展中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分工愈细密愈专门而形成的”。<sup>①</sup>他从“中国史料工作发展的历史”“史科学是一门科学”“史科学的党性和阶级性”“史料工作应为政治斗争服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史料的批判运用”五个方面阐发了自己对史科学的认识,<sup>②</sup>他的构想对马克思主义史科学在中国的确立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1983年出版的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科学》应是第一部中国古代史科学著作。陈氏认为,“史科学可大体区别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科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科学。”<sup>③</sup>作者将史科学分为史科学通论和具体史科学两大部分。就该书的内容来看,显然绝大部分属于具体的史科学。此后,不少学者延续这一分法,有的表述为理论史科学和应用史科学,同样也延续了重视应用而轻视理论的特点。白寿彝常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中国史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史科学的知识体系,他有较为全面的构画。比如,他在论及“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时,指出史科学“包含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应用的部分”。理论的部分“主要是研究史料跟史学领域其他部分的关系,史料本身的特点,史科学应当承担的任务”;历史的部分“是要研究史科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如就中国而言,就是要研究中国史科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分类的部分“是要研究史料的各部分分类的方法,目的在增进对各种史料性质的理解并因而便于收藏和检寻”;应用的部分指的是“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之类”。他进一步指出:“近年所谓史科学,大致属于第四部分之内容为多。涉及前三部分的内容者,可说很少。事实上,在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关于史科学的这四部分内容也都有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注意得不够,因而有关的成果不多。”<sup>④</sup>之后,关于这四部分内容的研究都有所推进,但重视应用部分而忽视理论、历史和分类的局面一直没有彻底改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集中发表了张注洪、张宪文和李永璞的三篇探讨史科学知识体系的文章。张注洪特别注重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史科学除研究具体史料的性质、特点、价值和利用外,还应有理论上的综合研究,包括征集史料、阐明史料源流、考证史料、评价史料、编纂史料、提供史料、利用史料七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sup>⑤</sup>对于史科学知识体系中理论知识的建构颇有参考价值。张宪文认为,史科学的学科体系要把完整地反映史料和分析、鉴别、考察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sup>⑥</sup>这对总体上构画史科学知识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永璞则提出史科学体系应该包含七个方面:一是史科学的概念,包括史科学的对象、地位、任务、定义;二是史科学的内容,包括阐述研究史料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评介古今中外历史的具体史料;三是史料的分类;四是史料的搜集;五是史料的考证;六是史料的整理;七是史料工作者的素质。<sup>⑦</sup>应该说,这已经相当完整,但仍没有注意史科学自身历史的演变。以上诸位学者对史科学知识体系的认识和

① 王可风:《史科学应成为一门科学》,施宣岑、华明编:《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

② 王可风:《史科学概论(提纲)》,施宣岑、华明编:《王可风档案史料工作文集》,第289—300页。

③ 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科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1—2页。

④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白寿彝文集》第4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

⑤ 张注洪:《关于建立中国近现代史科学体系的问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⑥ 张宪文:《中国现代史科学的任务体系和研究方法初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⑦ 李永璞:《史科学体系问题之我见》,《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构画,虽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都给予了我们重要启迪和思想资源。

综合前人的认识和设想,基于史料学发展的历史,笔者以为:今天理想的史料学知识体系应该包括史料学的概念、范式、理论,以及史源学、史料形成学、史料分类学、史料取用学、史料学方法论、史料与理论的关系等内容,可以分为四大板块:史料学理论、史料学方法、史料学实践、史料学史。

#### 四、史料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做法

要构建上述理想的史料学知识体系,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其一,在观念方面,应明确史料学在历史学中的学术位置。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文献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才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因为对历史学来说,它们不是必须的,只起到辅助作用,历史学可以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但它们不是历史学本身的构成。史料学则不然,因为历史学缺少了史料学,就不能称其为历史学。所以,判断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还是辅助学科,就看缺少这一学科后,历史学能否存在和成立。显然,历史学没有史料学是不能生存的,它是整个历史学大厦的根基。从重要性上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而从学术谱系看,史料学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

其二,应处理好史料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20世纪以来,史料学与历史文献学纠缠不清,史料学与史学史二者容易区分,与历史文献学纠葛难明。大学“历史文选”“要籍介绍”一类的课程,与“史料学”课程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也需要认清并妥善处理。史料学的学科宗旨非常明确,就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文献学没有这一宗旨;再者,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属于文字史料,而史料学包含不止文字史料,还有音像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等。另外,史料学与图像学、考古学、简牍学等也属于交叉学科关系。对于这些辅助学科,我们可能的做法是:只取其有关历史信息部分,只取其说明、解决历史问题的部分。

其三,加强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史的研究,从史料学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资源,这是史料学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史料学史的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史料学派研究、史料学文献研究、四大新史料发现及其史学意义研究、史料整理与鉴别研究、史料学思想观念研究、史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史料观念研究、二重证据法研究、史源学研究、各类史料基本特征及其价值研究,以及大学史料学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等。

其四,应注重当前史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教训汲取,注重史料学方法的提炼和研究,及时丰富和发展史料学。例如,桑兵在《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讨论史料问题,其中“晚近史料的边际与史学”和“各类史料的解读与运用”,<sup>①</sup>颇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对日记、函电、历史档案、报刊史料的细致解读,抓住了各类史料的本质特点,都是可以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心得和经验。

①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此外,我们还要注重与文学史、哲学史界的史料学交流、合作,为新文科的发展提供基础;要勇于开拓中国世界史史料学新领域,并借鉴海外史料学的学术成就,交流互鉴。

建构和完善史料学的知识体系是一个过程,不仅需要史料学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研究者的支持,还需要至少文史哲三大学科领域的共同付出,建立相应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学术互通,以会议、项目等手段,协同合作,定能推进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完善。在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史料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着更好的前期资源,二重证据法、层累说、史源学都是中国史学界对史料学的独特贡献,并非照抄自西方。有学者认为,20世纪前期,在中国产生的新的史料观念,“与现代西方新史学所倡导的史料观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史学家对国际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sup>①</sup>我们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史学,以及20世纪以来的史料学成就为基础和前提,以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和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契机,努力建构一个包括历史、理论、方法、实践在内的,切于实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学知识体系。

## 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

把增强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中正式提出的。这里所称的“三大体系”,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简称。“5·17”重要讲话发表后,学术界和理论界围绕如何开展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也随之提上重要日程。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契机,即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既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也直接加快了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步伐。

### 一、从自发自在到自觉自为:中国历史学者的内生动力

以“5·17”重要讲话为界,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在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当然,无论自发自在阶段,还是自觉自为阶段,其内生动力主要来自历史学界学者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自发自在阶段,稍作观察即可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至今活跃于史坛的老一代和中生代学者都发表过关涉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的论文。<sup>②</sup>

① 郭长刚等:《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第32、35页。

② 李政君亦认为,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看,学界在某一具体领域、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的相关探索,已经触及了历史学“三大体系”问题。不过,当时还没有构建历史学“三大体系”的理论自觉,相关探讨也多囿于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之内,难以统合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学科之下,因而称之为“自在”的探索更为适宜。参见李政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2日。